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丛书

夜郎青铜文明探微

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

张合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丛书

夜郎青铜文明探微

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

张合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郎青铜文明探微: 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 /
张合荣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325-8933-3

I. ①夜… II. ①张…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
贵州—战国时代 ②青铜器(考古)—研究—贵州—秦汉时代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7227 号

夜郎青铜文明探微

——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

张合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75 插页 8 字数 527,000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8933-3

K · 2524 定价: 10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研究受贵州省委宣传部2014年“甲秀文化人才”课题资助
(课题编号: 2014A06)。

本书系《贵州夜郎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年)》
学术成果,出版得到国家文物局资助。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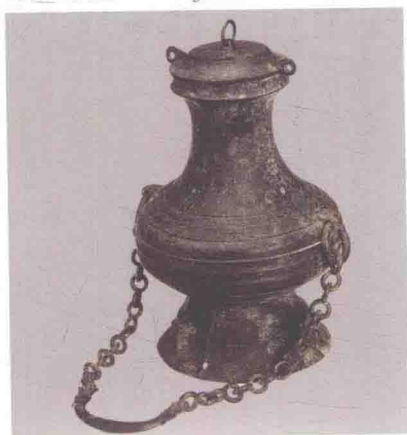
2



3



4



5



6

彩版一 青铜容器

1. 提梁鼎(务川大坪) 2~4,6. 铜釜(赫章可乐) 5. 提梁壶(兴仁交乐)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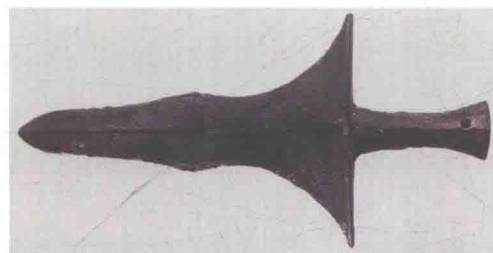
4



5



6



7



8



9



10



11

彩版二 青铜兵器

1~3. 铜戈(赫章可乐、辅处) 4、5. 铜剑(赫章可乐) 6、11. 铜柄铁剑(赫章可乐)
7. 铜剑(普安铜鼓山) 9. 铜柄铁剑剑茎(赫章可乐 M274) 8、10. 铜钺(普安铜鼓山)



彩版三 青铜装饰器

1. 曲棒形带钩 2. 琵琶形带钩 3. 牛头形带钩 4、9. U 形发钗 5. 人面形扣饰 6、11. 铜铃
7、8. 手镯 10. 簧首发钗(3 威宁中水出土, 4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 余皆赫章可乐出土)



1



2



4



3



5



6



7



8

彩版四 青铜杂器

1. 铜车马(兴义万屯 M8)
2. 铜驾车俑(兴仁交乐 M14)
3. 负罐鸟(清镇 M1)
4. 树形灯(兴仁交乐 M6)
5. 树形灯座(兴仁交乐 M6)
6. 鍍金铺首衔环(兴仁交乐 M6)
7. 日光镜(赫章可乐 M178)
8. 凤鸟饰(兴仁交乐 M6)



1



2

彩版五 贵州汉墓青铜器出土情况

1. 赫章可乐 M274(取自《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 2. 兴仁交乐 M14(黔西南州文物局供图)



1



2

彩版六 青铜器出土情况

1. 安龙 2008 年出土青铜器(可能系一窖藏) 2. 务川大坪汉墓底部朱砂与钱币共出

序

贵州地处我国云贵高原东部,这里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区。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对这些古代民族的历史缺乏了解。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古代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历史也应认真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一些记载,《西南夷列传》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在“西南夷”中,夜郎是一个大国,位于滇的东面,为定居的农耕民族,还提到夜郎有精兵十余万,后臣服于汉,被封为夜郎王,并受王印。司马迁的叙述是可信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是到过“西南夷”地区的,《西南夷列传》的记述应是他目睹耳闻的记录。他按头饰的不同将他们分为魋结和编发,按经济形态的不同将他们分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这在当时也是科学的。但是这些记载毕竟过于简略,对于研究古代夜郎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考古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夏鼐先生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因此在文献记载缺少的情况下,研究古代夜郎的历史,就成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

数十年来,贵州的几代考古学家踏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做了大量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遗存,证明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们生活、繁衍在贵州的土地上。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墓葬的发现在探讨夜郎历史方面十分重要。

我所知道的如李衍垣先生、宋世坤先生、席克定先生、熊水富先生、梁太鹤先生等,他们对赫章可乐墓地、威宁中水墓地、普安铜鼓山遗址等进行科学地发掘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研究夜郎文化打下了基础。在夜郎历史的探索中,他们以及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是做出了贡献的,这一点必须提及。

张合荣先生在贵州从事考古工作近三十年,参加过许多夜郎时期重要遗址、墓葬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加之其具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先前已经发表并出版了不少有关夜郎文化的论著,他的新著《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威宁中水的鸡公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相当于我国商周时期分布在黔西北、滇东北地区的一个颇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结合

“中水遗址群”的发掘,对研究夜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战国秦汉时期,从考古材料看,是夜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从物质文化上反映了这个“西南夷”大国的面貌。《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至夜郎侯亦然。”从此留下一个“夜郎自大”的典故,这个带有贬义、讽刺的成语一直流传下来。诚然,夜郎不知汉之大,两者根本不能比。夜郎侯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夜郎是“西南夷”中之大国,连“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考古发掘的上述墓地和遗址独具特色,出土了众多的青铜器,还出土有铁器及其他质地的器物,证明了战国西汉早期夜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性质都呈现出了一个高峰时期。所谓“夜郎旁小邑”应该就是依附夜郎的小国,夜郎臣服汉王朝以后,汉王朝在这里设置郡县,但仍然封夜郎的君长为夜郎王,并赐以王印。滇王的“滇王之印”金印已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中出土,在“西南夷”中,只有滇和夜郎的君长被封为王,“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司马迁之言不虚。这些都证明了夜郎是一个大国,所以“夜郎侯”可能自视甚高,因而才有“底气”与汉比大小,实际上却是“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才留下了这个笑话。

既设置郡县,又封夜郎的君长为王,大约是汉王朝中央政府为了缓和与夜郎族群的矛盾,笼络其上层的策略。蒙文通先生指出:“《史记·李斯列传》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但秦对蜀却是几次反,又几次封,这是很难理解的。秦既置蜀相,又置蜀国守,这在当时的制度上也很特殊。”“这就可见秦汉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内地不同,虽设置郡县,但邑君侯王依然存在。”(《巴蜀史的问题》,《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蒙先生此论甚是。

夜郎既为“西南夷”中大国,其位置所在,自然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夜郎在滇以东,又说“西南夷”在巴蜀的西南,而夜郎被称为“南夷”,邛笮被称为“西夷”,在探讨夜郎故地时,人们自然要把目光落在今日之贵州省境内。但是夜郎的具体位置,尤其是中心区域究竟在哪里,却有不同意见,众说纷纭,当然这些说法也各有其道理。根据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有条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夜郎故地之所在。

通过对贵州赫章可乐墓地、威宁中水墓地和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发掘,学者发现一种青铜文化遗存,根据对出土器物的分析,可断定它们的时代为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可乐墓地发掘出30多座“套头葬”的墓葬,这种葬制不仅不见于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贵州省内,目前也仅发现于可乐墓地。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和认真研究、思考的。“滇王之印”的出土,可以确定滇的位置在云南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区,位于滇以东、巴蜀以南的贵州西部的乌蒙山地区,可能还包括相邻的云南昭通地区,极大可能就是夜郎故地所在。赫章可乐一带也极大可能就是夜郎的中心地区,当然,目前尚无文字材料发现,仅是一种推测,但是这种推测是以考古学研究为依据的,希望有一日能发现“夜郎王印”。

夜郎文化是以国名或族称命名的,虽然对以夜郎文化来命名贵州西北部这个青铜文

化尚有不同意见,其实大家都在探索,若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我们裹足不前,对夜郎历史的研究也是有影响的。我国二里头文化目前也没有发现有关“夏”的文字资料,但是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只不过对二里头文化的哪些阶段为夏文化,尚有不同意见。这个夏文华的命名是根据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地区又是文献记载中夏的活动区域,也就是说其时空概念和夏是符合的。在贵州西部发现的这一文化遗存,在时代上和地域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夜郎也是符合的。再者进入历史时期,我国的考古学文化也往往以朝代或族称、国名命名,如“商文化”、“周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所以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夜郎文化,还是可以的。

今日之贵州居住着许多兄弟民族,在古代这一地区也是个多民族聚居区。所谓“夜郎旁小邑”可能和夜郎是同族,可能不同族,也可能是一些相对独立的小国,从文献记载来看,他们应是依附于夜郎的。在物质文化方面有其共同面貌,考古学上夜郎文化应涵盖他们。不同的民族,处在同一地区,在经济、生活各方面近似的情况下,他们所遗留的物质文化也会近似而很难区分,所以从考古学文化方面看,有时一个考古学文化可能包含不同的民族。蒙文通先生指出:在古代蜀国境内有许多小诸侯,“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巴蜀史的问题》)。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发现了许多从商周时期到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他们的文化面貌都相同,称为蜀文化,这中间可能有一些就是那些“小诸侯”的遗存。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对应的问题不能简单处理,尤其是在古代民族众多的地区,这个问题更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徐苹芳先生在《夏鼐与中国现代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夏鼐先生在《再论考古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中特别强调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族的共同体,我们当时都不太注意这个提示。其实这个提示具有极深刻的学术意义,他把考古学研究与族的共同体概念联系在一起,是根据中国古史的特点设定的,这是把中国史前考古上升到中国古史研究的一条途径。”(《考古》2010年第2期)夜郎文化已进入历史时期,但尚无文字,这一提示也是适用的,我们应好好地学习和领会。

夜郎文化虽然处于群山之中,交通不便,也并不是封闭的,尤其是和巴蜀、滇的交往较多,在夜郎文化中发现他们的文化因素也很正常。关于这种文化传播,夏鼐先生指出:“这可能是生产物成品被输入,也可能是生产产品的形式或生产方法作为观念被传播而为当地仿制。”(《再论考古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这两种文化传播途径,在夜郎文化中都是存在的,如可乐出土的柳叶形扁茎无格铁剑,明显是模仿巴蜀式青铜剑,而在巴蜀文化中,这种剑都是青铜剑,至今未有铁剑出土,只能是夜郎模仿巴蜀文化的青铜剑在本地制造。夜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而为本地制造,在弄清楚它们的来源之后,应把它们视为夜郎文化的构成部分,因为这些已为夜郎文化所接受而融入其中,就像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牙璋来自中原地区,十二桥文化中尖底陶器来自长江中游地区,但他们都成为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

战国西汉早期,夜郎文化虽然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文化因素,但自身特色十分鲜明。从西汉中期开始,夜郎文化大量吸收了汉文化的因素,这是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结果。唐蒙说服夜郎归附汉王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就会派一些官员到这里来,还有一些移民随之而来,这样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一些思想意识都会随之而来,必然会对夜郎原居民产生影响。在可乐墓地,土著人的墓葬和汉人的墓葬同处在一个不大的山间盆地,虽然还不能说是共处一个墓地,但也反映了这两种居民毗邻而居的情况。土著居民墓中既出土本民族的器物,也出土了一些“汉式”器物,这也和既推行郡县制又保留了当地邑君的统治地位有关。如滇归附汉王朝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夜郎同滇的情形一样,“上以为夜郎王”并授王印,大约是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社会结构。虽如此,民族融合的趋势已露出端倪。

不同民族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交往、影响,最后融合,是必然的结果,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也包括精神生活方面。西汉末年东汉时期,夜郎文化固有的文化因素逐渐消失,汉文化因素强势增长。如“套头葬”已不存在,砖室墓、石室墓大量发现,随葬品方面“汉式”器物取代了夜郎文化的器物,这种变化显示了夜郎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接受了汉文化。尤其是出土的“明器”更说明这种情况——对逝者的处理、安排,反映了人们的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东汉时期夜郎基本上完全融入汉民族中。这里讲的虽只是西南的某一个地区,但可看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过程。考古材料证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也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过程,这些显现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季羡林先生指出:“从先秦春秋战国的形势来看,中国本来很有可能走欧洲以后走的路子。但是,为什么竟没有走上去,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统一的文化背景。”(《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总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蒙文通先生说:“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欧洲较中国小,人口较中国少,反而长期是个分裂局面,就因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第2页)可见统一的文化背景、共同的传统文化,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就是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是从物质方面表现出来的。可乐墓地出土的印章,印文为“敬事”,就反映出了儒家思想。“敬事”一词源出《论语·学而》。《汉书·王嘉传》载西汉哀帝时宠幸董贤等,丞相王嘉上封事,其中提到“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孝文皇帝备行此道,海内蒙恩,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明,施与有节,记人之功,忽于小过,以致治平。”王嘉引用孔子的话就是要哀帝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所引《论语》这一段话,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道,治也……”说明儒家思想已传播到夜郎地区,这一现象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季先生说的“统一的文化背景”的内容之一,考古材料就是这统一文

化背景的实物见证。

《夜郎青铜文明探微》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夜郎的历史。从分析夜郎故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入手,探讨夜郎系统青铜器的形成和周邻地区青铜器的关系,进而探讨夜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夜郎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进程。这一成果在夜郎历史的研究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成果是在前一辈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对夜郎历史的研究,需一代一代学人通过不懈的努力,薪火相传地坚持下去。

宋治民

2018年5月6日于川大农林村寓所

目 录

序	(i)
第一章 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1)
第一节 发现概况	(1)
一、夜郎系青铜器发现概况	(1)
二、汉系青铜器发现概况	(6)
三、其他青铜器发现概况	(12)
四、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地域分布特征	(13)
第二节 研究述略	(15)
一、综合研究	(15)
二、专门研究	(18)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创新	(21)
一、研究对象	(21)
二、方法创新	(22)
三、存在不足	(24)
第二章 青铜器的型式划分和比较分析	(26)
第一节 青铜容器	(26)
一、铜鼎	(27)
二、铜盃	(30)
三、铜簋	(32)
四、铜豆	(35)
五、铜釜	(36)
六、铜锅	(59)
七、铜釜	(59)
八、铜瓶	(62)
九、铜洗(盘)	(64)
十、铜提梁罐	(71)
十一、铜耳杯	(73)
十二、铜甗	(75)

十三、铜奭(樽)	(77)
十四、铜壶	(78)
十五、铜铎壶	(88)
十六、铜碗	(89)
十七、铜匝	(91)
十八、铜铎斗(或称铜熨斗)	(92)
一九、铜量杯	(93)
二〇、铜盂	(93)
第二节 青铜兵器	(94)
一、铜戈	(95)
二、铜剑	(107)
三、铜柄铁剑	(125)
四、铜矛	(128)
五、铜钺	(131)
六、铜环首刀	(134)
七、铜镞	(135)
八、铜兵器附件	(138)
九、铜弩机	(139)
第三节 青铜生产工具	(140)
一、铜斧	(141)
二、铜铤	(142)
三、铜锄	(143)
四、铜削刀	(146)
五、铜鱼具	(148)
六、铜锥等	(149)
第四节 青铜乐器	(150)
一、铜鼓	(150)
二、铜甬钟	(152)
三、铜管耳状钟	(153)
四、铜钲	(156)
五、铜羊角钮钟	(157)
六、铜虎钮鐸于	(160)
第五节 青铜装饰器	(161)